



反抗絕望與臨歧徬徨——

也談周氏兄弟

另眼看作家系列之三

文字工作者 ◎ 蔡登山

對魯迅與周作人有深刻研究的學者孫郁指出（注），魯迅與周作人有著殊途同歸的一面，又有著截然不同的一面。魯迅之所長，恰恰為周作人之所短；周作人之風韻，又為魯迅所少有。一個張揚著生命熱力，在對苦難的抗爭中，把生存意義指向了永恆；一個恬然超然，默默地品嚐著生之苦澀，在忍受與自娛中，得到生存的快慰。不管你選擇了魯迅或選擇周作人，我們都無法離開這兩顆靈魂的餘影，他們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中繞不開的存在！！

我們知道他們兄弟二人，有著共同的經歷，相似的知識背景，相埒的學養，還有一份相通的人生感悟。他們曾經「兄弟怡怡四十年」，但後來卻因故絕交，兩人「終成參商」。分手後的魯迅與周作人之間多有交鋒，其間的夾縫文章，只有他們彼此看得懂。只因他們曾經最為相知，也就最能抓住對方的要害、摸清對方的罩門，於是處處針鋒相對的議論、招招見血的彼此搏擊，是兄弟間痛苦的、扭曲的對話。相互「理解」卻以這種方式達成，曾經相攜相知終相怨，這恐怕是他們雙方所始料未及的。

曾經和魯迅一樣，以反封建的戰士形象出現於「五四」文壇，借助翻譯和闡述的形式，將世界性的人文思潮，引入鼎革之際的思想領域的周作人，在歷史的遞進下，卻使得他惘然於種種進退的矛盾中。周作人曾自稱頭腦像一間「雜貨舖」：「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，共產主義與善種學，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，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，卻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，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。我只將各種思想，凌亂的堆在頭裡……」。斑雜的思想，常常使得周作人陷於無法解脫的「困境」中。尤其是他更並非一次地用「頹廢時代」，來形容明末亂世及其在現代中國的重演，並視為不可改變，無力改變的歷史宿命。他說：「巴枯寧說，歷史的唯一用處是教我們不要再這樣，我以為讀史的好處是在能預料又要這樣了；我相信歷史上不會有過的事中國此後也不會有，將來舞臺上所演的還是那幾齣戲……五四運動以來的民氣作用，有些人詫為曠古奇聞，以為國家將興之兆，其實也是古已有之，漢之黨人、宋之太學生、明之東林，前例甚多，照現在情形看去與明季尤相似；門戶傾軋，驕兵悍將，流寇、外敵，其結果——總之不是文藝復興！」。

這是周作人的「歷史循環論」，它起源於周作人自身經驗的多重幻滅，它既是對歷史（也就是現實）的抗議與譴責，又是意識到自身面對歷史的悲劇性循環，而無可奈何、難有作為的嘆息。但同樣痛感封建歷史的沉重因襲，魯迅是強化「絕望的抗爭」的衝動；周作人卻蒸發出

一股消蝕鬥志的冷氣。我們看周作人在〈晝夢〉中這麼寫道

我是怯弱的人，常感到人間的悲哀與驚恐。

嚴冬的早晨，在小胡同裡走著，遇見一個十四、五歲的小姑娘，充血的臉龐隱過了自然的紅暈，黑眼睛還留著處女的光輝，但是正如冰裡的花片，過於清寒了，——這悲哀的景像已經幾乎近於神聖了。

胡同口外站著候座的車夫，粗麻布似的手巾從頭上包到下頷，灰塵的臉的中間，兩隻眼現出不測的深淵，彷彿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，看不見地逼人，我的心似乎炙的寒顫了。

我曾試我的叫喊，卻只有返響回來，告訴我的聲音的可痛地微弱。

我往何處去祈求呢？只有未知之人與未知之神了。

要去信託未知之人與未知之神，我的信心卻又太薄弱一點了。」

而同樣地，我們看魯迅在〈影的告別〉中，又是如何地描述他的心境，他說——

有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裡，我不願去；有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裡，我不願去；有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泉世界裡，我不願去。

然而你就是我所不樂意的。

朋有，我不想跟隨你了，我不願住。

我不願意！

嗚呼嗚乎，我不願意，我不如徬徨於無地。

我不過一個影，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裡了。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，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。

然而我不願徬徨於明暗之間，我不如在黑暗裡沉沒。」

相對於周作人弱者的聲音，調子幾乎沒有什麼亮色；魯迅卻在悖論中，反覆地究詰自己的生命，而這種內省卻不斷地升騰著。「頹廢的歷史觀」最後又將周作人從高超的唯美之塔，引墮到「苟全性命於亂世」的低俗中，這不能不歸之他臨歧的徬徨。周作人的身上確實充滿著難以索解的矛盾，他既有紳士的一面，又有流氓的一面；就如他所說的是「紳士鬼」與「流氓鬼」的合身。他既有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，又常抱道家消極退隱的態度。他一方面鄭重地告訴人們：「我最不喜歡談政治」，從來沒有、也不願有任何政治信仰，而另一方面，他卻又在對日抗戰中掉進了最骯髒的政治漩渦——在日本帝國主義所操縱的政治舞臺中，翩翩起舞。在性格特徵上，一方面，他對人對事是那樣地謙和與寬容，而另一方面，又處處可見他在寬容遮蔽下的威儀，在謙和掩蓋下的傲慢和自負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。同年10月，南京、上海開始大規模檢舉漢奸活動。陳公博等從日本被引渡回國，關進南京老虎橋監獄。同年年底，周作人也因漢奸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，並送至北平炮局胡同監獄。據周作人晚年回憶：「在北京的炮局是歸中統的特務管理的，諸事要嚴格一點，各人編一個號碼，晚上要分房按號點呼，年過六十的云予優待，聚居東西大監，特許用火爐取暖，但煤須自己購備，吃飯六人一桌，本來有菜兩鉢，亦特予倍給。」在炮局胡同關了將近半年，1946年5月26日，周作人被解送南京，關押於老虎橋監獄。同行者有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蔭泰、偽華北財務總署督辦汪時璟、偽河北省長陳曾楨、偽北平市長劉玉書等十二人。

在老虎橋監獄，周作人最初住在忠舍，據他晚年回憶：「忠舍為看守所的一部，在西北的



一角裡，東西相對各有五間房子，每間要住五個人；北面有一個小院子，關起門來，倒也自成一個院落。」「忠舍的管理比較緩和，往來出入可以自由；煙酒什麼違禁物品也可輸入。」而據當時重慶《大公報》記者黃裳親自訪問周作人後寫成的〈老虎橋邊看「知堂」〉一文說：「這是一個小院子，裡邊是孤零零的一所紅磚房。其中一間間的小房間，從門口上面的一小塊鐵絲網窗中可以望進去，房子極小，可是橫躺豎臥的有五個人，汪時璟、劉玉書、唐仰肚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臥，有的在一疊餅乾匣上面寫信。梅思平在裡面的角落看書，殷汝耕在看聊齋，王蔭泰藏在牆角看不見。走道第四間，『知堂』剛剛回來，在裡面一角裡的席地上，脫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掛在牆上，赤了膊赤了腳在席上爬，躺下去了。旁邊放著一個花露水瓶子。」

而周作人解押到南京半個多月後，南京高等法院檢察官即對周作人提出起訴，列舉周作人主要罪狀如下：「其任偽職其間，聘用日人為教授，遵照其政府侵略計劃實施奴化教育，推行偽令，編修偽教科書，作利敵之文化政策，成立青少年團，以學生為組織訓練對象，泯滅青年擁護中央抗戰國策，啟發其親日思想，造成敵偽基要幹部。又如協助敵人調查研究華北資源，便利其開掘礦產，搜集物資，以供其軍需。他如促進溝通中日文化及發行有利敵偽宣傳報紙，前者為借文字宣傳達其與敵偽親善之目的，遂行近衛三原則之計劃，後者希圖淆惑人心，沮喪士氣，削弱同盟國家作戰力量」等。

面對這些指控，周作人則寫出「自白書」，進行自我辯解。他如前北平諸教授沈兼士、董洗凡、俞平伯、英千里、楊永芳（係周之女婿），還有前北大校長蔣夢麟、後任校長胡適等都替他的辯解作出證明，無非是說他與已故馮祖荀、孟森、馬裕藻三人是奉前北大蔣校長之命共同留平，保管校產的。周作人說他初擬賣文為生，後因環境惡劣，在家遇刺，大受威脅，加上湯爾和再三慫恿，才被迫出任偽職。又說他在國家存亡絕續之秋，必須有人冒犯不韙，共為維持；說他參加偽組織的動機完全在於維護教育，抵抗奴化，並不是戀慕做官；說他歷任偽職，並非特意鑽營而來，都是他人所強迫，即如日滿之行，亦為強迫而去，只在觀光；說他在任偽職期間，忍辱冒死，虛與委蛇，保全了北大等校的圖書儀器，使北大文化機關各種設備有增無減；說他曾發表論文論中國的中心思想問題，是為民族求生存的，是為有利中華民族的言論，以至被日本一軍國主義文人斥為「特殊之文學敵人」、「反動老作家」；說他曾營救和掩護過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及教育方面工作人員多人；說他在偽職期間因違抗敵寇政策，險遭敵憲兵隊逮捕；說他雖在偽組織服務，但自始至終潔身自好，跡無貪污，行無惡據，亦無反抗本國之圖謀，合於蔣介石對偽職人員『只問行為，不問職守』的『明訓』，故不能認定他有漢奸罪。

而在1946年10月25日，他在老虎橋監獄寫下了七律〈偶作寄呈王龍律師〉及跋文（案：刊登於11月3日的上海《文匯報》），其詩云：「但憑一葦橫江至，風雨如磐前路除。是處中山逢老牯，不堪伊索話僵蛇。左廡立語緣非偶，東郭生還望轉奢。我欲新編游俠傳，文人今日有朱家。」詩中大意是說他「一葦渡江」南來，在獄中已「面壁」十月，不能破壁歸去；「風雨如磐」，前路渺茫。而「以德報怨」的小人，像中山狼般「狠毒」地「下井投石」，必欲置之死地。但他終於也看到一線希望：一位與自己並無什麼交情的律師，如漢初俠客朱家仗義救人於危難一樣，「慨然允任義務辯護」，從而「東郭生還望轉奢」。他怎能不感激涕零，於是乃寄贈詩篇，目之為今日游俠。詩中對王龍（天端）律師的感恩戴德，反襯出對傅斯年等被他視為

「中山狼」的大加撻伐。傅斯年當時在重慶被委以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之職，將成為中央派北平教育界的接收大員，輕易不求人的周作人，最後還是向這位舊時的學生發了求助信函，但沒想到當時傅斯年卻公開發表談話，對所有附逆者的態度均是不留情面。他說：「北大原先是請全體教員內遷的，事實上，除開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，沒有內遷的少數教員，也轉入輔仁、燕京任教。……所以現在偽北大的教授，與北大根本毫無關係。」既是沒有關係，在北大復員中，他就要毫不留情地一概解聘偽北大教員；對周作人，他也公開表示因周「下水」是原則問題，他無法顧及師生之情了。傅斯年對北平教育界的嚴厲舉動，極大地打擊了日偽時期的教職員，也狠狠地給了周作人當頭棒喝。因此周作人對他恨之入骨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同為「五四」時代的溫源寧在評價周作人時，說他有「鐵與溫雅」。也就是說他「潔身自好，任何糾葛，他都不願插足；然而，一旦插足，那個攔阻他的人就倒霉了！他打擊敵人，又快又穩，再加上又準又狠，打一下子就滿夠了。」對於傅斯年，周作人終其一生，可說是絕不寬恕。這從他在獄中所寫的詩文，一直到後來傅斯年來了臺灣，周作人也出獄，他還是不斷地對傅斯年進行討伐，直到傅斯年去世為止，可見一斑。這不禁使我們想到他和魯迅兩人，曾經兄弟怡怡四十年，但一旦反目成仇時，周作人在偶或提及魯迅時，還是語多譏諷。比如在給江紹原信中說道：「即如『魯』公之高升為普羅首領，近又聞將刊行情書集，則幾乎喪失理性矣。」而在魯迅去世後，周作人發表的文章中，仍保持著某種疏遠的姿態，在肯定魯迅知人論世的深刻，學術的成就，及不求聞達的精神之餘，仍不忘點明他的「多疑」。即使到晚年，周作人在《知堂回想錄》中對魯迅有所感念，但也還顯現出他們之間的距離感。而相對於魯迅，在兄弟失和事件帶來的創痛多少平復之後，魯迅私下談及周作人時卻表現出他的大度、公允，甚至還有某種程度的護惜之情。在魯迅回答斯諾夫人「中國最優秀的雜文作家有哪些？」的提問時，魯迅列出的名單中第一位便是周作人；而在周作人因《五十自壽詩》受到左翼文壇嚴厲抨擊時，只有魯迅在給曹聚仁的信中給予了「同情的了解」，為其辯說「有諷世之意」。兄弟相較，此時魯迅卻顯得更「寬容」些。

因此一向以平和沖淡自居的周作人，有時卻有著「深刻潑辣」的一面，這正如他自己所說的：「平常喜歡和淡的文章思想，但有時亦嗜極辛辣的，有掐臂見血的痛感」。也就是說他一旦憤怒起來，會「抓到事件的核心，彷彿把指甲狠狠的掐進肉裡去的。」然而在抨擊傅斯年事件，甚至對整個「下水」附逆事件的辯解，周作人仍是為了「一己之私」，他從未認真去反思一個背棄民族大義的人，必陷於眾叛親離境地的必然性，而一味地指責他人，怪罪社會的炎涼。

論者指出，周作人一生有兩件事是他從沒有後悔過的，一是與魯迅的鬧翻，一是出任偽督辦。而在這一點上，他確實是保持了浙東地方性格中的「硬氣」，也可說是「溫雅中有鐵」。這不能不說是他性格中的另一面。而在肯定他在文學上的重大成就之餘，對於他這些矛盾的性格，我們也不能不加以辨明，或許它將使得我們更全面地了解一位作家。^[註]

注釋

注：孫郁《魯迅與周作人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7。